

14

第一辑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政协江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南昌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一 辑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4.75 字数 10.8 万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统一书号: 7110·222 定价: 0.35 元

编 者 的 话

江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近、现代史上,更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我们曾向各界有关人士和同志征集了一批历史资料。可惜的是,这些已经整理成文的历史资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多失散,至今未能找回。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立即重新组织力量,在有关各方面人士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和征求了一部分资料,并将其汇编成册,出版《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为着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能够更多、更全面、更系统地反映我省自“五四”运动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资料,我们殷切期望我省各地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同志,积极提供有参考、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与资料,形式、体裁不限,凡回忆、见闻、笔记、日记、书信等都可。年老体弱难以亲手写作者,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设法予以协助。

政协江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元月

目 录

回忆赣西南苏维埃时期	<u>曾 山</u> (1)
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回忆	何长工 (14)
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 实践	<u>陈正人</u> (34)
闽浙皖赣 (赣东北) 党史	<u>邵式平</u> 、汪金祥、胡德兰等 (66)
毛主席关怀赣东北	方志纯 (104)
抗战时期在山西工作的回忆	武人骏 (115)
崇贤农民暴动	李 挺 (133)
沉痛悼念赵寿先、焦伯荣烈士	廖少仪 (140)

回忆赣西南苏维埃时期

曾 山

(编者按) 本文是根据一九六一年访问曾山同志的记录整理的, 文末附录的两封信是照原件抄录的。曾山同志当时是赣西南苏区领导人之一。

一、大革命失败后和土地革命初期的政治形势

大革命失败以后, 江西的形势与全国有些不同的地方。自北伐军攻克武昌以后, 国民党省党部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很激烈。蒋介石到达南昌以后, 他就积极扶植段锡朋、周利生等右派掌握江西省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 使当时南昌市的工运、农运无法发展, 甚至全省工会与农协工作也受到限制。但在赣州、万安、吉安、抚州、九江等地, 因为有比较强的共产党领导, 所以工运农运的发展是很快的, 特别是万安全县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后来, 江西国民党省党部被左派掌握, 但省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军队仍属右派朱培德所把持。

南昌起义以后, 叶(挺)贺(龙)部队南下, 经过抚州、瑞金到达广东汕头, 使这一带的工农群众受到革命影响。但同时, 九江、吉安等地工农运动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阀的镇压。一九二七年三月反动派屠杀了吉安县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同志, 解散了农协并收缴了

农协的自卫武器，派兵下乡镇压群众，捉拿以至枪杀群众运动的领导人。

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运动遭到摧残，以致形势低落。南昌起义后，群众运动遭受摧残，国民党采取严厉镇压和屠杀政策，在九江杀了几十个革命同志，在吉安杀了梁一清同志等。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的赣西南各地，在广州暴动以后也陆续进行了暴动。但这些暴动都遭到失败。所以，当时革命形势已趋向低落。在党内也出现了一部分党员动摇、消极，积极分子逐渐减少的现象。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革命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这主要是一部分劳苦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坚持斗争。特别是在“八·七”会议以后，广大劳苦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向反动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八·七”会议是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召开的，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久，毛泽东同志带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改编了王佐的部队。王佐在大革命时期接受我们党的影响，拥护三大政策。王佐曾经打到永新，国民党反动派王钧部队进攻时，又退回到宁冈。当时在江西省委领导下有几个特委，还有许多县委。党组织和农会组织最有基础的是万安，农会公开的牌子虽然没有有了，但秘密农协的组织在当时县委领导下还是很完整的。

江西党接受了“八·七”会议精神，在广州暴动之后，万安暴动就爆发了。万安暴动是全县性的，影响到遂川、泰和和赣西南各地接连暴动。泰和县城就是万安暴动部队打下来的。万安暴动是被国民党方鼎英部队镇压下去的。在万安暴动胜利以后，方部一个军从广东到江西，直下万安，把万安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了。

因此，当时江西的形势，一方面是革命的低落，另一方面又表

现为工农革命运动继续在发展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参加广州暴动后回到吉安，吉安县委指派我担任泰和边的区委书记（区委设在田村朱家），后来又调我到吉安永福区任区委书记，工作只两个多月。在永福和宜化两个区，党的力量都很小，只有五、六百党团员，吉安县委指示要坚决地执行“八·七”会议的决议，举行暴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并没有接受广州、万安暴动的经验教训。只在接到“六大”决议以后，才改变了当时那种轻率地举行暴动的行为。

二、把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赣西南各地暴动失败以后，各地党的活动很自然地转入半隐蔽状态，积极地进行秘密组织群众的工作和发展党的工作，积蓄革命群众力量，同时在山区尽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为建立革命政权而斗争。在这方面，除了当时永新、遂川、宁冈革命根据地以外，吉安的东固、延福地区成为赣西革命中心地区的原因之一，是地形很有利。以东固来说，地位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有大山，地形非常好。所以，老百姓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当然，地形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东固这个地方原来农会的基础很好。这里盛产粮食，但农民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特别厉害，生活很苦，贫苦农民多，农民要求革命；还有不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譬如赖金邦、曾炳春、高克念等。特别是万安等地暴动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员逃到东固来了。万安暴动失败以后，队伍大都打散了，一部分上了井冈山，一部分革命群众来到了东固。一九二七年三月梁一清同志被杀害以后，吉安也有许多同志来到东固。这时，赖金邦同志便回到东固坚持革命斗争。他是

东固赖村人、大革命时任吉安县教育局长，是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东固原来有一支土匪武装，只有十五条枪。领导人是段起凤。赖金邦同志回到东固以后，便想法把段起凤的队伍争取过来，使之变成革命的队伍。当时吉安特委依靠赖金邦同志领导这支革命部队，以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以后发展成为有名的赣西南红军二团，以后又发展成为黄公略的红军第三军的一纵队。所以，赖金邦同志在组织这支革命武装方面，是有很大功绩的。国民党反动派很恨他，派兵把赖村的全部房子烧光了。

延福区的（吉安、新余、分宜、峡江、安福几县之间的边区）情况与东固不同。延福地区参加革命的多是青年学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有很多土地。开始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起来的，所以开始时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吉安特委和省委派了得力的军事干部，如陈伯钧、李湘岭、柯武东同志等，加强了领导。因此，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便很快地发展起来，编成黄公略红三军第二纵队。黄公略红三军第三纵队部队，是以永新县为中心的地方革命武装编成的。

赣西南等地党的领导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接受了过去暴动的经验教训，许多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也逐渐懂得了这些教训：如果条件不成熟，专搞暴动是不行的，不仅暴动得不到胜利，连革命工作同志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很自然地认识到，在敌人力量大的地区，要作隐蔽的秘密工作，并且把秘密工作和山区的武装斗争工作结合起来。这两方面配合得好，敌人一有什么动静，马上派人向革命部队报告消息；平时打土豪、筹款也是事先有人去把情况摸清，使游击队便于取得给养，对东固和延福这几个革命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武装进攻，与我们打过多次仗。特别是罗炳辉的五县联防部队，和我们打过许多次，最后把罗炳辉争取过来，吸收为

党员，率领所部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团，后改编为红三军一纵队的一个部分。当时，农村、城市、白军内部都有我们的秘密工作，各地党组织经常介绍人到东固、延福来充实红军部队，使我们的革命部队不断地得到补充。后来甚至把罗炳辉率领的五县联防部队也争取过来了，他带过来一百八十多人，一百五十多条枪。那时候白区、国民党军队在吉安一出动向东固、延福等地进攻，地方党就知道，马上将敌人的行动通知游击部队，消息非常灵通。因此，强大的敌人找不到我们的部队，敌人有时又常被我游击部队歼灭或打垮。

敌人三次围攻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曾经从井冈山下来到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数次。毛泽东同志给东固游击区留下了许多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同志，其中有毛泽覃同志，加强了东固游击根据地党的领导工作。这些同志带来了各方面的许多好经验。特别是红五军彭德怀同志派黄公略同志到赣西南地区，把红二、四团和延福、永新等地区红军编入第三军以后，赣西南苏区的军事斗争和苏维埃政权更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指导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讨论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分配土地和成立苏维埃政府。对分配土地问题，会议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以江西省委特派员江汉波和特委委员李文林二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按耕种能力多少来分配，即谁种得多谁就可以多分土地，耕种能力小或无耕种工具的雇农就少分地以至不分土地；以刘士奇同志和我，还有郭承禄（延福地区党的负责人）等同志为代表，不同意江、李的意见，主张按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平均分配土地。这二种主张在“二·七”会议前和会期中争论很激

烈。在“二·七”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来到东固、富田，出席了“二·七”会议并指出平均分配的办法是正确的；谁种得多、谁就多分土地的办法是富农路线。“二·七”会议以后，由于各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贯彻决议，形势就大大的不同了。半年之内，武装迅速扩大了，土地进行了分配。苏区采取的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并查清了分配土地的情况。当时发现执行得不彻底，又提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进一步彻底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苏区迅速扩大了，广大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各县苏维埃政权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二·七”会议前，各地还叫革命委员会，“二·七”会议以后，就公开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从这以后，赣西南特委和在南昌的江西省委已经没有联系了。

三、赣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和演变

我只能就我知道的这段谈起。一九二九年春，冯凌同志到赣西特委书记。我也是一九二九年春被特委扩大会议选为特委委员的。我原来的名字叫曾如柏，冯凌同志怕暴露我，故替我改名为曾山。以后吉安的团特委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影响到赣西党的特委，一共被捉去七、八十位党团员。冯凌同志回南昌省委去后，由刘士奇代理特委书记，临时派我到延福区兼任区委书记。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在富田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正式选举刘士奇、曾山、龙超清、谭思聪等十七人组织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同志为书记。会后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选我任主席，仍回特委工作。

一九三〇年三月，红四军在水南打了唐云山，消灭了他二个整团以后，向赣南地区行动，六月打到广东的南雄。当时我参加总前委随红四军行动，肖道清同志（肖当时是总工会委员长）任代理主

席职务（当时总前委是随红四军行动，他们打到那里，那里地方上的高级党组织应派一负责人参加前委）。后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我便从南雄去上海中央参加会议。李文林也从赣西南苏区到上海，因迟到未参加苏区代表大会。这时赣西南特委的几个负责人除刘士奇和我以外，还有刘铁超、王怀、丛容中、段良弼、李文林等人。

李文林从上海开会回来以后，借传达中央指示，召开赣西南特委二全会，把刘士奇同志的特委书记撤掉了。刘士奇同志便回上海中央去了。一九三〇年八月间，总前委派来朱参谋长传达中央指示，要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省行委。省行委委员由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王怀、段良弼等五人组成，以李文林为书记。

吉安城曾经打过八次都未打开。省行委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一方面军在二次攻打长沙以后攻打吉安。打开吉安城以后，在吉安城内，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改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省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推我任省苏主席。主力红军打开吉安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向北进军，直到峡江，先头部队接近清江。总前委在峡江发起与江西省行委开联席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军事部署，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强大的敌人已到南昌向清江前进。打开吉安城以后，大块新苏区未能巩固，红军主力离开巩固的苏区与强大敌人作战不利，主张红军后撤，诱敌深入苏区以利歼灭进攻的敌军。而李文林在联席会议上坚决反对红军后撤，理由是：不打南昌、九江，会师武汉是违背中央路线的（即立三路线）。但到会的多数同志包括我与陈正人同志都是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主力后撤的主张。因为这样能巩固苏区，又能诱敌深入，有利于歼灭进攻的敌人。以后，红军主力执行了总前委的决定，后撤并准备消灭第一次“围剿”进攻的敌人。

四、江西省委的恢复

苏区中央局派任弼时同志和顾作霖同志来恢复江西省委，任弼时同志任书记。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后，他们又回苏区中央局去了。全苏代表大会后，陈正人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春在宁都桥头举行过江西省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陈正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作了省委工作报告。以后陈正人同志生了病，——吐血，中央派李富春同志来当江西省委书记。这以后，中央苏区江西省委书记一直是李富春同志担任，只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准备长征，李富春同志调回中央，才由我代理了一个时期的省委书记。

省苏在兴国也开了一次代表大会，省苏主席仍然是我。一九三二年初，省委由兴国搬到宁都，接着省苏也搬去。一九三三年在宁都召开了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省苏也在宁都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刘期耀任省苏主席。

江西苏区第一次省党代表大会是陈正人同志负责，第二次省党代表大会是李富春同志负责。

省委以下直接管辖县委或中心县委，没有设特委一级。苏区内省委以下设县委，边远一些的地方就成立中心县委，代理省委管理几个县委工作。当时有永丰中心县委、万泰中心县委（毛泽覃曾任万泰中心县委书记，最多时，省委管辖二十二个县委组织。

五、关于赣西斗争有关的几个问题

（1）赣西特委破坏前后的情况：赣西地区从“五卅”运动以来就有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领导下，吉安周围各地都举行了暴动。所有这些暴动都是按照“八·七”会议进行的，并且都被敌人压下去了。但是，它对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对保存革命干部

和革命武装来说，都有重大意义的。

赣西特委是一九二九年被破坏的。在此以前，特委机关一直设在吉安。这次遭受破坏后才转入农村。党的特委被破坏是从团的组织遭破坏开始的。敌人这次逮捕了我们八十多位同志。特委破坏后，冯凌同志（特委书记）即去南昌找省委，但一直没有回来，估计省委也遭了破坏。从此以后，我们便与省委失去了联系。特委秘书长刘士奇同志代理特委书记，将特委机关迁往陂头。省委破坏后，有段时间的工作是没有人管的，各地根据“六大”精神各霸一方。打开吉安以后，赣西南的工作实际上是前委领导的，前委一直没有离开江西。三次反围攻后，前委带领军队打开瑞金的土围子，筹备成立苏区中央局。

（2）攻打吉安问题：赣西特委遭受破坏后，广大群众曾八次攻打吉安，但都没有攻开，直到第九次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才攻开了吉安。当时攻打吉安是为了组织群众扫清吉安外围，每次攻打吉安都有目的。没有夺得城市，群众买不到东西，所以攻城最能发动群众，一动员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群众参加。攻打吉安，不能称为“左”倾路线，因为这时不象“八·七”会议后不久的情况；攻打吉安也不是立三路线的主张，完全是群众性的。所谓“左”倾盲目，就是没有群众，条件不成熟，强迫起义。而我们打吉安时已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群众，并且吉安周围进入了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的新阶段，群众积极性高涨。在几次攻打吉安的过程中，我们根本没有强迫群众。因此，攻打吉安应该看成是党领导下的群众行动。

（3）土地政策问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发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平均分配土地。“二·七”会议以后，又加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两条。群众对于土地分配

法是满意的。

博古他们没有到苏区来以前，苏区的群众很团结，大家都武装起来了。那时的政策是好的。政策不好就是博古来了以后，实行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样的政策是不能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是九个打一个。后来还将地主赶出苏区。当时我们自己也感到这个政策不对。

(4) 江西苏区的游击斗争问题：红军长征是敌人先知道，我们后知道。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李富春同志写信要我回省委去，说他要回中央工作，由我代理江西省委书记。接着项英同志又来信要我马上到瑞金去。到瑞金后，他和我谈了两小时话，就要我立即回来。在谈话中，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他认为红军走后，国民党的军队就会跟着走，因此，只划了到广昌的六个连给江西省委指挥，要我们坚持在江西地区（这时江西还有宁都、乐安、永丰、万泰、公略五县）。结果，敌人的五个师来打我们。我们败得很惨，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冲到新干时全被打垮，最后剩下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负了伤。这段斗争是很残酷的，经常是几天也吃不上饭。

当时假若估计到形势的严重，主动地转入地下，和敌人搞两面政策是可以坚持的。我们到了万泰以后，便开始转变，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想往南冲，冲不去，改往北冲，最后遭受失败。

(5) 抗日时期的有关问题：我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南昌来的。东南局（没有东南分局）也在这时成立。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集中部队。我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道同志是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涂振农是统战部长，陈丕显同志搞青年工作。

东南局管江西、福建、浙江省委、江苏的盐城以南和皖南。搬往皖南后江西有一部分仍然为东南局管，另一部分为南方局管。

江西省委是在六中全会前后成立的。省委成立时有赣东北特

委，由谭启龙同志任书记，当时在河口还有新四军办事处。

我在延安开完六中全会后，大约在一九三九年元月才回南昌，接着开会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传达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敌后游击基地，要在敌后壮大我们的力量，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好象是省委的成员参加这次会议，赣北特委书记是否参加记不清楚。

附录一

关于峡江会议情况的两封信

陈毅同志：并请转

江西省峡江县中共县委：

一九三〇年十月间，在毛主席领导下，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原是赣西南特委，立三路线时改为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在峡江县罗坊举行过重要会议。到会的人，除由毛主席主持会议外，有彭德怀、袁国平两同志，军队还有其他同志（忘记了姓名）参加，江西省行委有李文林、曾山、陈正人三人，还有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一）在已经占领的苏区发动群众，开展向土劣斗争，组织贫农团，以至分配土地，武装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二）又根据当时敌情，毛主席提出不应前进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后撤，依靠在老苏区群众和许多优越有利条件，来歼灭进攻苏区的敌人。确定了诱敌深入歼敌的重要方针。在进行讨论时，首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个正确的主张的是袁国平与李文林两人，袁、李两人不仅不同意红军主力后撤，而且指责毛主席不打南昌是断送中国革命，是违背党中央的路线（立三时的中央路线）。事实上是袁、李二人的主意。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的是周以栗、曾山、陈正人及其他几位军队的同志。后经过周以栗同志把

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去向彭德怀同志个别说服谈话以后，彭德怀同志最后接受了毛主席提出的红军主力后撤诱敌深入歼敌的主张。会议结束以后，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省苏都转移到吉安，在吉安召开了赣西就近各县负责人会议，由我传达了峡江县罗坊会议决定的精神。毛主席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还决定，赣西特委由王怀同志领导向西撤，省行委、省苏府向东撤，首先撤到陂头，以后转移到富田。以上是我回忆当时情况的一些意见，因为年数久，记忆差，请指正。

敬礼

曾山

1961年1月30日

附录二

中共峡江县委会：

你们二月十二号来信，所询问1930年在罗坊，毛主席当时所领导的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举行重要会议情况，是我前次给你们的信所谈的不会错的。当时峡江县苏维埃成立了，我们红军是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当时企图向南昌进攻的。我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清江，当时发现蒋介石敌方已派五个师兵力由南昌向樟树、清江前进。当时江西省苏与省行委已到峡江县城以北数十里驻扎，总前委（即毛主席领导的）驻在罗坊附近，举行罗坊会议。江西省三人曾山、陈正人、李文林，参加了罗坊会议。时间是十月，或十一月初是难以记清楚。但罗坊会议是一点也不错的。罗坊当时是峡江县领导的。因为红军打下吉安以后，不久就向北发展，罗坊只是红军到后才有工作。当时可能是沿江而下，暂归峡江县领导可能性大。当时罗坊一带的地方工作，主要是红军政治机关与省一级的工作队在